

国学家与教书先生：梁启超晚年的学术生活

◎ 黄 湛

1917年11月，梁启超卸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一职，于1918年年底，偕同蒋百里、丁文江、张君勱等人，从上海启程，展开了酝酿一年的欧游计划。此次远行，历经伦敦、巴黎、比利时、荷兰、瑞士、意大利、德国诸国，并于1920年3月归国。《欧游心影录》就是梁启超对这一年多来欧游经历的观感纪闻，从中可以发现梁氏心境的转变：目睹“一战”后欧洲空前失落萧条的景象，梁启超开始重新审视西方社会，反观和重估中国固有文化，催生出晚年的教育思想。故丁文江等人为梁氏所作《年谱》，谓欧游“是为先生此后致力于教育事业的起点”。^①

近人为梁氏作传，一般根据其政治活动、学术思想，将梁氏一生划分为四个时期，每个时期都有特殊的贡献与影响。第一期自万木草堂到戊戌变法，是“通经致用”时期；第二期而立宪请愿到辛亥革命，是为介绍西方思想，并以新方法批评中国传统学术时期；第三期为参与内阁、兴师讨袁至

^① 丁文江、赵丰田编：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553页。近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展“院史工程”，编纂清华国学院师生、职员的文存。其中，《梁启超文存》即以《欧游心影录》为节点，收录梁氏此后与学术、教育相关的重要文章。参见刘东、翟奎凤选编：《梁启超文存》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。



欧游以前，是为“纯粹政论家”时期；第四期为入校讲学、专力学术时期。^①20世纪20年代，步入晚年的梁启超，似已过了人生的全盛期。他虽在社会上仍极具名望，但政治上的黯淡收场以及思想上趋于保守，已不再如他早年一样能够引领风尚，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既有的认知，让人仅仅关注梁启超晚年的治学成果，却容易忽视其具体的生活和经历，并从中体察其心境的变化及思想主张背后的情感寄托。

一、文献与德性：治国学的两条大路

梁启超在学术研究和讲学教育上夙具心得，欧游归国后，即决心不再过问政治，专心教育事业，着手承办中国公学，同时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。又整顿原研究系的杂志《解放与创造》（后改名为《改造》）。其中，讲学社的主要工作，是邀请国际学术名家来华讲学。在梁启超的领导下，讲学社先后请来美国哲学家、实用主义大师杜威，英国哲学家罗素，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，以及印度诗人、哲学家泰戈尔。从“四大名哲”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，可见讲学社的学术品位和工作成果。

尽管欧游让梁氏错过了国内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，但到了20年代，新文化运动余波未了，大江南北仍充斥着“打倒孔家店”“全盘西化”的口号，传统文化被视为不适应现代文明社会、保守落后的“旧文化”。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提倡，正是为了纠正这种极端的西化论。新文化运动中，新青年们把西方科学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，梁启超却要为传统文化发声。胡适后来就说：“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，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‘科学’的，直到民国八九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《欧游心影录》，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‘破产’的宣告。”^②胡适的说

^① 参见张荫麟：《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》，收入夏晓红编：《追忆梁启超（增订本）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9年，第84页；另见徐佛苏：《记梁任公先生逸事注》，转引自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第775页。

^② 胡适：《科学与人生观》，季羨林编：《胡适全集》第2卷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96页。

法或许有些夸大其词，其批评旨在说明，梁启超作为文化舵手、广大青年的引导者，他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可能会导向一种极端——蔑视科学的“不良”效应。

实际上，在崇尚学术研究的“科学精神”上，梁启超与胡适是志同道合的共事者，这一点就国学而言，特别体现在两人对乾嘉治学“科学方法”的阐扬上。早先胡适《戴东原的哲学》、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已对戴震的“科学方法”及其哲学有一番深入讨论。在两人的努力下，学界兴起一股“戴震热”。1923年10月，梁启超发起“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”，一个月后，尚在上海的胡适致书表示愿赴此会，并言及东原遗像坊间不传，已托人向其族中求索（东原为休宁人，胡适祖籍绩溪，两人是徽州老乡）。^①在研究思路和学术评价上，两人都强调戴震反程朱理学、批判宋学的特质；同时认为在治学方法上吸收了传统考据学和西方科学，具有“科学精神”。不过据说到了纪念会那天，《晨报》特别印刷专刊，场内散发的全部都是梁启超一人的文章。开会时，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，只给胡适留下十分钟，并介绍说：“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，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原！”^②不知任公如此“霸道”，胡适作何感想，抑或两人事先有所商量亦未可知。

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清华国学院”）之前，梁启超正筹备办一所“文化学院”，培养国学人才，最终因缺乏资金，未能成事。清华国学院的办学宗旨与他一直以来振兴国学的想法不谋而合，故当即应允国学院的邀请。1923年年初，曾有一个清华学生前往天津，告诉梁启超清华学生苦于无人指导国学，并向他请教哪些学者可堪清华国学导师之任。梁启超则告以无人可选——如此回答，是由于梁氏认为学问渊博者多，但教育未必得法。^③他心中实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教育理念，按照他

① 胡适：《致梁启超》，《胡适全集》第23卷，第416页。

② 梁容若：《梁任公先生印象记》，收入《追忆梁启超（增订本）》，第284页。

③ 《与梁任公先生谈话记》，载《清华周刊》第271期，1923年3月1日，第20-22页。

自己的话也可以理解成：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。这套方法早先呈现在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中，这是梁启超 1923 年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一次演讲。他指出，治国学应遵循“文献的学问”和“德性的学问”两种门径。其中，“文献的学问”运用客观方法加以研究；“德性的学问”则通过内省和躬行的功夫来完成。^①科学方法和道德修养是梁启超晚年提倡的并行的学术宗旨。他在给清华国学院学生做演讲时，对这一学术宗旨做了更明确的说明：

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，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，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，参合着旧的精神。吾所理想的，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。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，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。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，任便做那一家，那都可以的，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。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，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，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。至于智识一方面，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；而我希望的是，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，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。^②

梁氏坦言自己到清华国学院任教，是要借以实现教育理想和抱负。自从新文化运动鼓吹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（民主与科学）以来，中国传统学术——特别是儒家思想——成为封建、愚昧的代名词。梁启超试图打破这种偏见，一方面强调应在学术研究上秉持科学方法，“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”；另一方面，身体力行，宣扬磨砺人格的重要性，希望与一班弟子共建国学的精神，“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”。^③

① 梁启超：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，1923年1月9日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演讲稿，载1923年1月15日《晨报副刊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373页。

② 梁启超：《北海谈话记》，载1927年初夏《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692页。

③ 梁启超：《北海谈话记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697页。

在那些受其启蒙的“新青年”看来，梁启超竟落入文化“保守”的窠臼。但是，与当时从未涉足欧美大陆、未尝了解西方文化的“旧派学者”相比，梁启超实在不能算是“传统知识分子”。三十年前鼓吹变法改革时，梁启超就以介绍西洋文化为务，启蒙思想，创造新民。只不过在详细了解西方文明之后，梁氏回过头来，比任何人都对本国文化抱有温情，甚至不讳言：“只要旧的是好，守旧又何足诟病？”他所谓的好与坏，取舍标准不在于是本国传统还是舶来品，而在于文化价值本身。从这一点看，国学相比西方先进的科学，自有其特别的长处，这也正是国人建立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：“我们中国文化，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。那一般沉醉西风，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，自属浅薄可笑。”^①梁氏在充分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，对中西文化比较后所进行的深刻反思，绝不是盲目排外一类学者所可企及的。他反对的其实更应该说成是一种“轻下批判”的态度，对国学也好，西学也好，都应予以全面周到的考察。

同样是在1923年，梁启超给国学研究的大课题列出一张详细的清单。这是他在策划创办文化学院时，刊登在报纸上的文化学院创办宗旨，其中写道：

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，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，全世界无论何国、无论何派之学说，未见其比，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；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，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，亟宜爬罗其宗别，磨洗其面目；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，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，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，全在我中国人；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，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，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；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，其资料之丰，世界罕匹，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，今日已到不容扁辘之时代，而开采

^① 梁启超：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381页。



须用极大劳费。^①

以上述五事为基础，本国学术为“内发的心力”，培养国民“新元气”，进而“创造新中国”——这是梁启超由学术以至于经世致用的教育兴学方针。他观察到，当时全世界正处于“怀疑沉闷时代”，中国在精神和智识方面都足以贡献全人类。西方科学固须重视，但不应妄自菲薄，鄙夷传统文化。知识分子在任何时期都应保持头脑清醒，偏执的守旧或者盲目的崇洋媚外，都不是客观科学的态度。值逢举国崇尚西学，趋之若狂之际，梁启超即以发明整理本国学术为自己应负的教育义务，他说：“启超虽不敢自命为胜任，然确信我在今日最少应为积极负责之一人；我若怠弃，无以谢天下。”^②由于对本国文化抱有充分自信，故其从事研究，方能投入完全的热情和精力。也只有纯粹的不计个人名利的教育信念，才能不惧怕受到万众的非议以及自诩进步知识分子的诬蔑。梁启超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，教育事业非他一人发宏愿即可促成，必须集合相当学力的同志，培养热心兹业的青年，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。事实上，直到去世，梁启超一直都在贯彻这一理想，为此孜孜不倦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梁启超所划定的“两条大路”，在他日后执教清华国学院时，完全展现在课程讲义和指导研究中。历史是“文献的学问”中“最浩博、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”，也是他晚年投入最多的研究领域。至于如何研究历史，他认为应借助中国丰富的文献史料，加以西方的科学方法，“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，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”。^③梁启超在1922年即已完成《历史研究法》这部名著，几年后到清华及其他学校，又陆续开设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”“中国文化史”“历史研究法”“读书法及读书示例”等课程，这些讲义稿后来都刊行成书，成为梁氏晚年学术著作的主体。在国学院任教时，梁启超又设立中国文

① 梁启超：《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》，载1923年1月21日《晨报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389页。

② 梁启超：《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390页。

③ 梁启超：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374页。

学史、中国哲学史、宋元明学术史、清代学术史、中国史、史学研究法等研究领域，供学生选择专题完成指导论文。^①

针对“德性的学问”门径，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，除了平日演讲中不厌其烦地宣扬道德修养的重要性，还专门系统讲授“儒家哲学”一课作理论的说明。^②梁启超认为，在哲学领域中，西方的形而上学虽有其独到之处，但讲到人生哲学，难望国学项背。所谓人生哲学，即以人生为出发点思考各种问题。儒家讲宇宙人生不可分，“宇宙的进化，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”。儒家又讲求“仁”的人生观和人格的社会群体性，即人类之间精神相通，通过内省的功夫进行体验，进而躬行实践，提升个体的人格，以此作为社会整体人格进步的动力。此外，佛教自传入中国，发展壮大，形成一套独特的哲学。虽讲出世，但中国的佛教在宇宙人生的问题上却与儒家哲学都追求“一大人格实现之圆满相，绝非求得少数个人超拔的意思”。儒佛也同样以“自由之精神”作为人生的境界，“把精神方面的自缚，解放净尽，顶天立地，成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”。在梁氏看来，人格修养不仅是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且是“国学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”。^③

二、来到清华：既开风气又为师

三江五岭钟灵气，惯会八方风雨。草堂万木开经筵，一时豪杰如许。扬南海，抑中山，高睨雄谈如龙虎。维新未遂，算滇南护法，马厂誓师，平生志半吐。

① 学生中如姚名达、吴其昌、谢国桢，即分别师从梁氏研究“章实斋之史学”“宋代学术史”“清代学术史征”。参见《研究院纪事》，载《国学论丛》第1卷第1期，1927年6月，第299-302页。

② 课程内容涉及“儒家哲学是什么”“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”“儒家哲学的研究法”“二千五百年儒家变迁概论”“儒家哲学的重要问题”（性善恶、天命、心体）等方面。参见梁启超：《儒家哲学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701页。

③ 梁启超：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376、381页。



廉颇老，晚年息影清华，遍释群经诸史。春风桃李三千人，黔发朱颜玉树。凌云志，生花笔，甚似五星聚东鲁。鹅湖盛会，朱陆各扬镳，独步杏坛，呼王陈共语。^①

这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周传儒，为悼念导师梁启超所作的《摸鱼儿》，完整地呈现了梁氏一生各阶段的重要行迹。词的上阕总结梁氏从事政治的过往，下阕则是对其晚年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描写。1925年，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国学门，简称“清华国学院”。^②聘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为导师，五星繁奎，盛比鹅湖。梁启超讲儒家哲学、历史研究法等课，又在大学部讲中国文化史，同时为燕京大学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，实为一生用力最专、治学最勤、写作最富的时间。

清华大学始建于1911年，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成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。1925年2月，先是“学衡派”领袖吴宓出任清华国学院的筹备主任。对于导师人选，吴宓心中早已锁定王国维、梁启超两人。他最早接触的是住在京城的王国维，不久后，又赶赴天津，亲自谒见梁启超。梁氏当时住在天津河东旧意租界玛尔谷路的花园洋房（二楼房间即“饮冰室”，供梁氏写稿作文之用）。吴宓拟聘梁启超，不仅考虑到梁氏具有良好的社会和学术声望，与当时不少人的经历一样，吴宓少时即得梁氏“启蒙”，素有崇拜之心，他说：“儿时读《新民丛报》，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。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，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。”^③两人一番洽谈之后，梁氏即表示“极乐意前来”。

清华学校坐落于北京西郊，其中游泳池、图书馆、科学馆和大礼堂为近代著名建筑。园内旧有建筑则有工字厅及古月堂，后临荷池，石山

① 周传儒：《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》，收入《追忆梁启超（增订本）》，第324-325页。

② 当时“清华学校”正转型为新制大学，原打算把研究院与大学部一起筹办，建立与本科相衔接的多科研究院。但因经费所限，以及根据国内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现状，考虑到其时国学研究“尤为重要”，便决定先设国学门一科。

③ 吴宓：《吴宓诗集·空轩诗话》，上海：中华书局，1935年，第149页。

起伏，松柏环绕，名曰“水木清华”。位于东侧的清华学堂，即国学院师生上课讲学之地。梁启超执教清华后，入住于北院2号。北院在当时是校内造价最高、设备齐全的别墅式洋房，建校之初专为外籍教师居住，故又有“外国地”或“小租界”的别称。梁启超任教的年代，只有国内极少数最有声望的中国学者才有资格居住，可见清华对梁氏的重视。

梁启超与清华渊源颇深，早在1914年，梁启超就假馆清华学校著书^①，清华校训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亦来自梁氏本年在清华的演讲。其中，梁启超勉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，培养“完全人格”，做“真君子”：

英美教育精神，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宗旨。国家犹机器也，国民犹轮轴也。转移盘旋，端在国民，必使人人得发展其本能，人人得勉为劲德门（笔者按：英文gentleman绅士的音译），即我国所谓君子者。……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，言“君子”者凡五十三。乾、坤二卦所云尤为提要钩元（钩玄）。乾象曰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坤象曰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。推本乎此，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。^②

① 梁启超于1920年后常来清华讲学。1922年起在清华兼课，担任国学讲师。1925年应聘为国学院导师，为国学院规划和教学贡献良多。1927年下半年，梁氏因身体状况欠佳，在8月3日给弟弟梁启勋的信中，透露准备陆续辞去一切工作及社会职务，却“独于清华不能无眷眷”。是时清华刚刚设立董事会，梁氏与清华素有“历史上关系”，故感情上于董事一职“总不能忽然”。意欲担此要职，以便对学校发展和教育方针有更多话语权。（信件参见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264-265、486页。）到了1928年，因时局及身体原因，梁氏内心更倾向于归隐养病著书。虽然自1927年以来频频表示要辞去诸事（特别是久病不愈及与校长曹云祥不睦的人事原因），但他在1928年5月8日的家书中仍表示：“我清华事到底不能摆脱，我觉得日来体子已渐复元，虽不能摆脱，亦无妨，因为我极舍不得清华研究院。”（《与思顺书》，1928年5月8日，转引自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第758页。）直到1928年6月，才彻底辞职。

② 梁启超：《梁任公先生演说词》，1914年11月清华学校演讲稿，载《清华周刊》第20期，1914年11月10日，收入梁启超著、夏晓红辑：《饮冰室合集·集外文》（中册）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602-603页。



所谓君子，应志愿宏大，具有坚忍强毅的精神，于逆境中不屈不挠，见义勇为；另一方面，还应宽以待人，气度雍容。于此乱世之中，作为留美预备部的清华学校集合四方俊秀，崇德修业，师友间切磋学问，互相促进。以本国学问为根柢，他日海外游学，方有能力学习西方知识和文明，进而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，“挽既倒之狂澜，作中流之底柱”^①。

1925年9月9日，国学院第一期正式开学。开学典礼于上午举行，下午全体师生到工字厅举行茶话会，会议由吴宓主持，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李济四位导师相继发言（时陈寅恪尚未到校）。在学生的要求下，梁启超额外做了题为《旧日书院之情形》的演讲。之所以在新式大学的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讲“旧日书院”，实是看到大学授课制度基本上只专注智识的培养，缺乏传统书院对个人修养的重视。梁启超在一年后的国学院茶话会上，再次表达了相近的观点：“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，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——高一点说，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——更加以最新的教育精神。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，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。”^②

每于暑期将近时，梁启超还会约学生同游北海，“俯仰咏啸于快雪、浴兰之堂”。快雪堂是乾隆年间，直隶总督献上所获《快雪时晴帖》石刻，乾隆帝遂特增建快雪堂院落，并将四十八方书法石刻放置其中。1923年，为纪念蔡锷将军的“倒袁”功绩，快雪堂成为松坡图书馆的馆址（笔者按：蔡锷字松坡）。与蔡锷有师生之谊，且参与“倒袁”的梁启超任该馆馆长。不仅如此，快雪堂还曾是梁启超在北京城内的一处居所。他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就提及，自己一周之间一般在清华住四日，其余三日则入城住在松坡图书馆。^③北海公园及松坡图书馆直到1925年8月才正式对外开放，此年恰逢清华国学院成立，快雪堂不仅是梁氏师生的雅集

① 《梁任公先生演说词》，收入《饮冰室合集·集外文》（中册），第602-603页。

② 梁启超：《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》，载《清华周刊》第389期，1926年11月12日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628页。

③ 梁启超：《与宝贝思顺书》，1923年11月5日，转引自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，第646页。

场所，还偶尔邀请名师讲学其间。1926年暑假，梁启超即请张君劢同游，学生吴其昌记录称，张氏“为诸同学讲宋贤名理，盖穆然有鹅湖、鹿洞之遗风焉”^①，不难想见当日群贤毕至、偕游论道的情形。

1906年，张君劢东渡扶桑，考入早稻田大学，其间结识梁启超。梁启超赴欧考察，张君劢亦随侍左右。1923年，文化界兴起一场“科学与玄学”论战，张君劢提出：“科学无论如何发达，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，决非科学所能为力，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。”^②针对丁文江驳之以“科学万能”的观点，张君劢回应说，科学是就经验界的知识而言，无法解决形上真理的问题，从而提倡一种“新宋学”。^③当时梁启超正在翠微山养病，因怕二人过用意气有伤和气，便充当调人，撰文表达客观中立的立场。他说：“人生问题，有大部分是可以——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。却有一小部分——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。”^④既批评张君劢轻蔑科学的态度，又否定丁文江对科学万能的迷信。特别是针对当时社会甚嚣尘上的科学至上、全盘西化的论调，梁启超提出在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之外，还应讲求“爱先生”“美先生”。爱与美是作为生活原动力的“情感”。“‘科学帝国’的版图和权威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，这位‘爱先生’和那位‘美先生’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‘上不臣天子，下不友诸侯’的身分。”^⑤认为无法用科学方法分析情感、宗教和人生观的全部问题，其主张显然与张君劢强调的“主观的、直觉的、综合的、自由意志的、单一性的”人生观一致。^⑥梁启超邀请张氏一同游北海讲宋明理学，亦不难窥见其中深意。

① 《北海谈话记》文前吴其昌附识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690页。

② 张君劢：《人生观》，1923年2月14日演讲稿，载《清华周刊》第272期，收入黄克剑、吴小龙编：《张君劢集》，北京：群言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14页。

③ 张君劢：《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》，《努力》第50、51期，1923年4月29日、5月6日，收入《张君劢集》，第167页。

④ 梁启超：《人生观与科学》，1923年5月29日《晨报副刊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401页。

⑤ 梁启超：《人生观与科学》，收入《梁启超文存》，第403页。

⑥ 张君劢：《人生观》，收入《张君劢集》，第114页。